

郭沫若 作品经典

第二十六册 脱离蒋介石以后



二十世纪
中国文学大师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GUO MORUO ZHUO PIN JING DIAN

郭沫若作品经典

第二十六册

脱离蒋介石以后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脱离蒋介石以后

我们是三月二十四号离开蒋介石的——也可以说是蒋介石放走了我们。

去年十一月八号总政治部派我们到九江去做工作，本来预定的是两个礼拜，但一到了九江，老蒋就不肯放我们回来了。从此便在他的形同监视之下，做了半年的秘密工作，他始终是不肯放我们回来的，尤其是对我个人。他在南昌的时候，不知道对我说过多少次，要我住在他的周围，就是三月十五号他临走的一晚上也还对我说过：“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，现在李仲公被他们扣留了，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。到了长江下游，有多少宣言是要请你做的。”象这样的话，他在九江的时候也亲自对我说过两次。

三月二十二号的晚上我奉到中央^①的电令，叫我到上海去组织总政治部分部。那是一个普通电，老蒋当然是瞒不过的，所以我在第二天的清早便拿着电报去见他。

当我还没有把电报拿出来的时候，他先就对我说：“听说武汉有电报叫你到上海去啦。”

① 作者注：当时的武汉政府。

我说：“是的。”我便把电报拿给他看。

他说：“这次到上海去，赶快要把‘总司令行营政治部’的招牌打出来了。你是要跟着我同去的，到了南京、上海，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。”

不消说我依然是敷衍着他。

他委我为“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”是三月十四号，委任状现还保存，委任状写的是三月一号。关于名称和人选上他也很费了踌躇。起初他是想用“东南总政治部”的名义，以邵力子为正主任，以我为副。后来决用了新名，更承他的“皇恩浩荡”把正主任的荣衔加给了我。——我现在是让给吴老头子（稚晖）去了，我想那个儿老头儿一定是在暗中感谢我的。象我这样的人实在是“不识抬举”；他委我为政治部主任，而且每月还津贴我三百元大洋的费用，我却反脸无情，竟至把他“卖”了，不消说我和我们邓大主任（演达）一样，又是一个“忘恩负义的坏蛋”。

他委我为政治部主任的事情是很秘密的，在总司令部里面只有四个人晓得，就是老蒋、总参议的张群、军务处长陈焯、我。委任状是陈焯写的，印是张群盖的。张群在十四号亲手把委任状交给我的时候，他诚心诚意地向我贺喜，我还当面回过他们：要请他们吃大餐的呢。

但是，知道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却不只这四个人，当老蒋授意于我，要委我为政治部主任的时候，我早就密电了中央，并且将他当面对我说的话也密告了。他叫我和武汉脱离关系。他的叛逆，在那时候我已经就得着了确实的证据，我们那时候早就可以离开他了。但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叫我“虚与委蛇”，好到长江下游去再做秘密工作。所以我也就成了一个“私娼”，做了

一个秘密的政治部主任；因为老蒋那时还在掩耳盗铃，他这个命令要到了南京之后才能够公开。

他已经相信我到这样的程度，既委我为政治部主任，又准备要我做扬雄——替他做《剧秦美新》的宣言^①，我真是枉也冤哉，看看便要由“私娼”而公娼了。我老早就想不顾一切，丢了就跑；但是我一人跑是很容易的事情，我跑了，我们那里的几十个同志不免就要大受冤屈，要带着几十个人同跑那可不是很容易的事了。

在南昌所过的烦闷的生活，现在已用不着回述，一句话归总，就是无时无刻不是想跑的。

好了，我们奉命到九江了。在九江跑是比南昌更容易的，就带着几十个人同跑也并不是好难的事情，因有一水之便，一船便可以跑回武汉。但是那时候我们的野心又起来了。三月十六号到九江，“三·一七”惨案发生后第二天他就叫我们先到安庆去。我们以为只要离开了他，在安庆还可以做些工作，所以又决心赶到安庆，但是结果是我们前脚到，他后脚就来，来就发生了“三·二三”惨案。一个炸弹打下来，把甚么都打得一个粉碎，还说得上甚么工作计划吗？又加以“三·二三”惨案我算是他的阴谋的一个破坏者，我的真面目他应该知道，他一定是含恨入骨的。我们假使还要在他的口中，那是只有听他咽下了。

但不料准备着早迟听他咽下的我们，却遭了他的恩赦。

他在二十四的清早，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我，信是这样写的：

^① 扬雄，西汉文学家。王莽篡位后，作《剧秦美新》以奉谀，为世人诟病。

沫若同志，等候不及，中正先赶赴下游，兄与一民兄同来。中正。

得到了他这张赦令，我们那时候是怎样地快活呀！我真不知道，他怎么能够那样地放心，竟肯把我们放手。或许他正是不放心，所以才没有叫我跟着他去的吧？但这个哑谜儿，我现在也没有工夫来猜想了。

我们虽然脱离了他的虎口，但仍然是在他的虎肘中的。朱一民就是监视我们的人。而且自从他走了以后，安庆的左派分子都集中到总政治部的周围，总政治部和他们总司令部形成了两个对垒。青红帮的流氓们天天造出谣言，要来捣毁总政治部，并且要用暗杀手段来对付我们。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的那几天，我们真正是有点岌岌不可终日。那时候上下行船都没有，真正是如象陷在天罗地网里面的一样。

其实安庆当时的局面，自老蒋走后，在客观上或许还缓和了些，不过在主观上我感觉得十二分危险的，是在二十五日我去游说过一次李宗仁以后。

一

李宗仁的江左军总指挥部是设在安庆的工业学校。二十五日上午十时，我和辛焕文同志两人去访李宗仁。李宗仁是我的酒友，同时如象李仲公、朱一民、俞飞鹏诸人都是我的酒友。我是借酒来韬晦，同时也是以酒为钥匙去打开他们的秘密关锁。可是酒给我的恩德也就不浅了，我的两耳几乎要成为全聋，我的睡眠也被它替我剥夺掉了。以后或许是我用不着酒的时候了，这是我的一个希望。

那天很冷。我们到李军长那儿的时候，他正和陈调元的党代表袁熙绩在围炉谈话。我们到后，袁熙绩便告辞走了。我们便立刻喝起酒来。

一面喝酒，一面把许许多多的话来打动他，希望他在安庆举事，肃清一切反革命派的势力。

那时候在安庆举事是很容易的。拥蒋的武力只有陈调元的两营人，反陈的有蔡文彬的一旅。蔡和陈是势不两立的，蔡在前已经解决过陈部杨世荣的队伍。老蒋到安庆抑蔡，他留朱一民在安庆的任务就是要强迫蔡部出城。蔡文彬不消说是不甘心的。“三·二三”惨案发生后，二十四的晚上，蔡派人到省党部和政治部来接洽，说他可以举兵反陈，但怕李宗仁解决他，想

得到这一层保障。我们去说李宗仁，一半也就是为这个原故。我们把甚么话都说尽了，李宗仁的头脑似乎也明白，但他总下不起决心。他知道蒋的恶迹，他知道“党权运动”^①的意义，但他对于蒋总还不免有些姑息和顾忌的地方。最后说得我烦躁起来，竟扬声愤气地说：

——“象老蒋这样残杀民众的叛徒，只要是忠于革命，只要有良心的人，那个不应该起来反对他！我现在就首先反蒋！”

这一说也把他激动了，他说：“只要中央有命令我就干。”

我说：“现在中央的命令那里能够来？一切通信机关都被他封锁了。你干了，中央是只有嘉奖你的；并且又不是反对他，只假着不知道他的秘密，我们起来肃清反革命派，他是有苦难说的。”

他说：“我只有一营人怎么干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只要有一连人都敢干！”

实际我最痛心的，就是总政治部的武力只有两支驳壳枪，那时我们假如真有一连人，把一切反革命派都可扫除干净了。

——“好，干！干！干！”李宗仁把右手握成拳头向空中举了几下，再说了一次“干！干”，但接着他就萎下去了，又连说“厉害，厉害，我要睡”。我看他脸色也转苍白了，他的确是醉了。

两个人谈了半天，喝了一瓶半的白兰地——焕文是不喝酒

^① 1927年2月，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在武汉举行会议，议决实行民主，反对独裁，提高党权，扶助工农，由吴玉章、邓演达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。翌月，蒋介石被撤免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、军委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。“党权运动”遂在全国展开。

的，他也先走了。我把李宗仁扶上床去，他立地就睡得人事不省，结果是今天的一场游说算是布了一场迷魂阵。

自从我说了李宗仁一次之后，我自己便感觉着危险了。无论上行也好，下行也好，那时候我急于想离开安庆，但是不凑巧地那几天都没有船。我那几天实在有些焦急。

最令人着急的，是二十六的那一天。

那天有一只兵舰开来，朱一民发出一个通告，要总部各部处的人全体准备出发赴南京，这时候真令人两难。同去呢，不仅工作做不动，且又陷入老蒋的虎口之中。不去呢，老蒋立地就晓得我们是反他的，他一封电报给陈调元或者其他的任何青红帮的首领，都可以囚禁我们，甚至致我们于死地。幸好一只兵船载不下总部全部人员，我们等他们各部处的行李、人员都上了船，朱一民也上了船，船快要开的时候，才派辛焕文同志去问一民说，我们有几十担宣传品和几十名人员，该安置在那里；一民说没有地方安置。我们便叫他们先走，随后另外弄一只差船赶去，于是便闪过了这一重难关。我们和老蒋以及他的爪牙，便全部脱离了。

安庆非可久居之地，青红帮已与我们为仇，随时都可以袭击我们。我从二十六号起已经改了装，移住于城外候船，但是船是始终没有的。一直等到二十八的一天，杨正宗同志领导着南昌留守的人员，坐了一只差船来到安庆，我们才遇见了一个救星，一个意外的救星。

我们离开南昌的时候，留了一部分同志在后方留守。我们所担心的便是这一部分人，怕的是我们与蒋脱离了关系，他们会不能走脱。亏得杨正宗同志也是善于“做上层工作”的人。他竟把总部留守的张群瞒过，能够公开地带领着全部人员出发。他

们不仅是做了我们的救星，而且给了我们无上的安慰。我们在安庆江边重逢的时候，真是如在梦里了。

二十八日全体同志都上了船，我们是决计到上海去了。因为船上没有灯也没有旗号，便派人到第八师去接洽。快要到午后两点钟的时候，派去的人还没有回来，朱克靖同志和他的夫人来了。

克靖是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，他是从武昌来的。过九江时船没有停，便一直把他拖到安庆来了。他把武汉的情形告诉了我，说是中央已有坚确的决心一定要罢免蒋介石。同时他是负有重要的使命到九江去报告朱培德军长的，他要求我们把船送他回九江去。往返九江也不过三两天的工夫，再加上海方面我已经派了十个同志去做工作，那方面也还有许多重要的人可以指挥一切，所以我就决计送他回九江。

三

那时九江在形式上还是反动势力的下边。我们到九江是三月二十九号，国际工人代表团也是在同一天到的。

到了九江，我同克靖便去见朱培德军长。我把安庆的情形报告了他，朱军长显得很有决心，也象很有计划。他当天便发出了命令，把当涂的第九师团调回，集中安庆。南浔铁路沿线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第三军的势力范围。江西方面蒋介石的残部是很惊惶失措的，不过他们依然还在蠢动。同时就在我们到达九江的一天，我们还得着一个顶快心的消息，那就是中央在三月二十三号已经罢免了蒋介石的职权。那时候我们真是高兴，以为从此长江下游更是不成问题了。朱军长及其他同志们劝我在江西再做一番工作，我也觉得还有到南昌去一次的必要，因为一切的通信机关都被蒋介石封锁了，安庆“三·二三”惨案，连相隔仅仅几点钟水程的九江竟连一点风影都不知道。我觉得应该趁着这个时候，把蒋的罪状宣布出来。所以我便把部里的人除掉少数人留在九江之外，通统遣回了武汉，我的意思是要他们回来报告消息的。我于三月三十日便同克靖同志同赴南昌。

南浔铁路的检查是很严密的，我们所有的行李都经过了检查，我假充为第三军的一个参谋，姓高名叫浩然。

南浔铁路沿线的春光是很明媚的，仅仅离开了两个礼拜的江西，已经成了一片锦绣的世界。四处的桃花都在开放，杨柳已经转青了，一片金黄的菜花敷陈在四处的田亩上，活活的青水流绕着沿线的溪流，清脆的鸟声不断地在晴空中清啾。这些亲切可人的自然，对于两礼拜来日日焦头烂额的我，不免更觉亲切。自己的心中虽然怀着些轻淡的不安，无名的恐怖，但总觉得是回到了故乡来的一样。不过每逢车一到了一个车站的时候，总怕把头伸出窗外，总希望停了的车火速再开。

南浔铁路是不能直抵南昌的，终点的牛行车站与南昌城还隔了一道章江。章江也浩浩荡荡地涨满了一江春水，淡黄的江水上浮着无数的浮沫，要比如群鸥——可惜是黑黄色的。天上也时有白色的水鸥翻飞。这些泡沫的浮岛，有人说可做肥料，怕是沿流土岸中硝质的溶集。

渡过章江，由章江进城，我把眼镜取了。我倒没有看见甚么认识的人，但不晓得有没有认识的人看见了我。

进了南昌城，一直便跑到东湖边朱玉阶（德）同志的家里，我便住在那儿。玉阶本是第二十军的党代表，因为杨森不信任他，他便到了江西，在第三军充教育团的团长。这次江西能够免受蒋介石的屠戮，江西能够成为革命势力的范围，玉阶所率领的教育团，是有不小的功劳的。

——“你认得我么？”

我看见朱玉阶夫人便首先问她。

——“怎么不认识你？你是吹号的。”

说了便不觉大笑。“吹号的”！这个徽号的来源，真是一个绝大的耻辱。那是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的事。二周年纪念的一天，在南昌方面因为大雨，大会没有正式举行。十三、十四

是公奠的日期，十五又才正式开会。因为到会的群众将近二十万人。蒋介石的声音不能传遍，他便叫我用传话筒替他传达。那时候我不该过于卖力气了，因为我的声音素来大，我便替他传达起来。他说一句，我传达一句，传到后来他的演说才完全是反革命的论调。他叫江西群众要拥护江西省党部（以前的伪省党部），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就是反革命，反革命的就要把他打倒。这些话当着二十万的群众面前，也不能不给他传达，我真想把传话筒来打得他一个半死了。但为情势所迫，只得忍耐着又出卖了一次人格，昧了一次良心。我在江西半年，可以说完全做的是这样昧良心、卖人格的工作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不觉犹有余痛。玉阶同志说得好：“蒋介石是不识抬举的东西！”

这“吹号的”一个徽号，大约就是从那次大会赢得来的。受了别人的践踏，卖了自己的人格，有苦难诉却还要受社会的骂名——听说在我未正式反蒋之前，武汉的同志有不少的人怀疑我，上海的同志更有人准备做文章来骂我了——这种工作真不是人干的，然而也忍耐着干了半年。蒋介石哟，我还要痛骂你一句：你真是不识抬举的东西，不识抬举的狗东西！

我自己的性格素来是倔强的，这一次把我磨练够了。我自己就好象已经成了一个无聊的政客，我很替我自己危险。我想以后我还是要恢复起我的倔强性来。干得下去就干，干不下去就拉倒。我不愿意再替任何人捧场。自由恋爱还可以，不情愿地被人强奸总是不情愿的。

在玉阶家里总共住了四天，头一天去见王副军长治平，向他报告了安庆的情形。他也把南昌的情形详细对我说了。南昌自从蒋介石走后，总部留守的张群和伪省党部、伪省政府打成了一片，几次收买流氓、伤兵来想大肆屠杀，但都被王副军长

镇压下去了。张群志不得逞，很想用武力来对付第三军，但这条小狗总还没有大狗的胆量大，在四月二号的清晨，终究不安于位，“逃之夭夭”了。

四

在玉阶家里一间光线不十分充足的室内，第二天的清早便开始草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，手不停披地写了将近一天的光景才脱了稿，脱稿后便拿去付印了。

第三天又草了一篇《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》，这篇文章是偏重在理论方面的，好象没有传到武汉来。

把这两篇文章做了之后，我赴南昌的使命算是完毕了。本来决定在第四天四月二号的清晨走的，因为张群同在那个时候走，所以不得不避开他，改到下午。下午走到章江边上的时候，火车已经开了，又不得不改到明天。我是四月三号的清晨才离开了南昌。

四月二号的下午，南昌的民众团体，实行解决伪省党部，捉了二十几个反动分子，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程天放。

这位程天放，可以说完全是段锡朋的工具。他做了一回伪省党部的宣传部长，又荣升为伪省政府的教育厅长。在他未做部长之前，有人介绍他来请我委任他为军官团的政治指导员，我拒绝了。他有一个流芳百世的典故，就是解释帝国主义者为“地大物博的国家”。他的程度是怎么样，那就可想而知了。

程天放被捉，我特别到总工会去观光了一次。我看见他那